

新视野 新观点

文章编号:1001-747 (2009)02-0129-05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G852.1

# 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及其理论在武术研究中的应用\*

温搏<sup>1</sup>,张云龙<sup>2</sup>,袁金宝<sup>3</sup>

(1.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福州 350007;2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062;  
3. 宜宾学院 体育系,四川 宜宾 644077)

**摘要:**通过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分析探讨,揭示出整体论、文化比较、文化相对主义、历时性与共时性等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以及文化变迁、文化整合、文化安全等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武术研究的密切关系,认为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及其理论应用于当代武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武术研究;文化全球化

##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Method and Theory in Wushu Research

WEN Bo<sup>1</sup>, ZHANG Yun-long<sup>2</sup>, YUAN Jin-bao<sup>3</sup>

(1. Sports and Science Colleg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2. School of Sports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3. PE Dept., Yibin Institute, Yibin 644007,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has analyzed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theory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iscovered that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theory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relate closely with Wushu research. The authors believed that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applications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method and theory in Wushu researc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cultural anthropology; Wushu research; cultural globalization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表达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宗旨,因为文化人类学的使命,就是要站在人类文明整体高度上,去辅助具体的学科实现它们的价值。“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当代武术已经面临全球化发展趋势,它越来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文化窗口,成为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文化枢纽。武术的文化传统,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西方文化、体育的冲击,已经出现了文化危机。如今随着国力的增强,复兴武术文化的时机已经来临。传统武术文化的复兴,有赖于对它做出与时俱进的全新诠释与科学决策。“文化自觉”逐渐成为武术学界的共识,“文化传承”也成为武术研究的重点<sup>[1]</sup>。因此,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及其理论来研究武术,揭示武术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1 文化人类学及其研究方法概述

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体质和社会文化的独立学科,自 19 世纪中期形成以来,在国际上已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关心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决策性学科。

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人类学的理论积累日渐丰厚,理论流派与分支学科趋于多元化。文化人类学就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学科,即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且比较各民族、各部落、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团的文化相同之点和相异之点,借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sup>[2]</sup>。同时,文化人类学也是一门综合研究的学科,它是从“人的文化、文化的人”这个角度来探讨人及其文化发展的脉络、规律,研究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人与自我之间的互动关系等课题的综合性学科,是一个研究范围极其广泛的学科,用徐杰舜先生的说法,文化人类学就是一个“千手观音”,也正因为如此,现在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纵观文化人类学发展历史,不难看出,文化人类学的原初阶段是以研究部落社会中的原始民族以及他们的文化现象为主旨的。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

\* 收稿日期:2008-10-24;修回日期:2009-01-04

基金项目:2008 年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研究项目(WSH2008D006)

作者简介:温搏(1970-),男,陕西西安人,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武术文化及武术教学与训练;张云龙(1955-),男,上海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族传统体育学;袁金宝(1980-),男,山东德州人,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高校体育教学训练。

文化人类学发展出了自身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作为一门研究“人”的正式学科,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及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对整个文化的研究及其推进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人类学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对文化的认知和阐释采用过多种方式。从人类学形成之初的古典进化论到文化传播主义,从法国社会学派到美国的文化相对主义,从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到美国的新进化论,从结构主义到符号与象征以及晚近的解释人类学等,从特定意义上,都是在寻求对人类文化的认知,并力图对人类的文化进行解释<sup>[3]</sup>。经过一个半世纪的不断演替,一些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被人们普遍运用。如整体论的研究方法、文化比较法、文化相对主义与主位和客位的研究方法、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研究方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应用于武术文化研究,也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同时,文化变迁、文化整合以及文化安全等文化人类学理论研究,对于武术研究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 2 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与武术研究

### 2.1 整体论的研究方法与武术研究

整体论(Holism)一词是由英国在南非联邦的统治者施穆滋(Jan Smuts)于1926年创造的。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中指出施穆滋对整体论的释义是:“它把宇宙看作神秘的‘整体系统’,强调并宣称‘整体’不能归结为它的组成部分。它认为英国是某种高级的‘整体’,把它的组成部分说成是‘整体’的‘部分’,宣称‘部分’应绝对服从‘整体’并为之服务<sup>[4]</sup>”。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由生物哲学研究学者胡文耕所撰写的“整体论”(Holism)条目作了这样的概括:“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是由各部分、或各种要素组成的,但各部分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理论。整体的性质大于其组成部分性质的总和,整体的规律不能归结为其组成部分的规律<sup>[5]</sup>”。

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文化整体观指的是人类学家在研究一种人类行为时,必须研究与该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的行为,即多角度、多方位地研究人类经验的众多方面。他们认为一种文化的整体特质或特征,并不等同于构成该文化整体的部分特质或特征的简单相加。因此,在人类文化研究中,就应该把各种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来加以探讨。其次,文化人类学家在比较各民族文化时,注意的是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传递给下一

代的。在对不同民族的行为模式的比较研究中,人类学家认识到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各自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在我们自己的文化系统之外,世界上还有数不清的其它文化系统;自己所属的文化系统不一定是最好的,别人所属的其他文化系统也不一定是差的。再次,文化整体观还有一个特别表现,即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人无论从地域还是从时间的角度看,都比其他学科广阔。总之,整体性作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原则,意味着在研究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侧面时,都应该与其它方面结合起来考察。

武术是一种围绕技击而展开的徒手和持械的中国传统运动技术体系<sup>[6]</sup>。我国武术门派有百余种之多。尤其是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全中国武术挖整工作以后,对于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仅四川省武术遗产挖掘小组就整理收集了1093个徒手套路,518个器械套路,41个对练套路,276个练功方法和14个技击项目。由此可见武术内容的丰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应用在武术研究上,就是要全面把握武术这一文化现象。武术在技术上具有技击特点,在文化特征上有民族特点。失去了技击性,就不能与同类技击术相交流。失去了文化性,就失去了民族性,也就会被同化,而不再具有世界性。武术的民族特点具体体现为:风格多样的套路,细腻的技巧方法,丰富的拳械体系,深层的文化特征——内外兼修等<sup>[7]</sup>。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来审视,武术套路作为一种技艺,其背后映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sup>[8]</sup>。中国武术正以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因此,在推广武术的过程中,要坚持整体观的方法论。从本质上讲,推广武术就是推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广一种“文化的传统武术”,而不是“运动的现代武术<sup>[9]</sup>”。

### 2.2 文化比较法与武术研究

人类学是一个比较的学科,这是人类学的一个特征。人类学的立场是全貌的,目标是全人类<sup>[3]</sup>。作为人类文明的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许多相异之处——物质的、精神的、社群的。人类学比较的方法很多,其中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就是要在特定的场合下对两种异质文化进行比较。要进行不同文化的比较,只有弄清双方文化因素的层次对位情况后,才能判断在互动过程中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可能对应情况,也才能准确地将相关的事实成组地归纳起来。

在全球化背景下,把武术作为一种东方文化的代表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把武术与空手道、跆拳道、泰拳等东方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比较研究,以及把武术不同门派、不同地域之间进行比较研究,都是

十分必要的。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武术同其它东方传统体育项目的比较研究,有利于中华武术的国际化发展,同时,也可以为武术申奥提供新的思路。因为,中华武术是优秀的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的根本。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天然纽带,它以血缘与地缘为依托,将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与性格凝聚在一起”。“民族文化的丧失就是民族精神与民族品格的丧失。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就会不打自垮,既不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更不能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世界文化做出贡献”<sup>[10]</sup>。同时,在迅疾而又强烈的文化全球化大潮冲击下,当前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步调无疑还需进一步提速。放眼世界,面向未来,从国家文化时代发展的高度确立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发展战略已刻不容缓<sup>[11]</sup>。

中国武术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以或明显或隐秘的方式折射于当地的文化现象之中。譬如,岭南文化是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东是岭南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文化的主体精神在这里形成和发展。岭南文化是广东南拳形成的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文化土壤,其兼收并蓄、勇猛刚烈、传统保守与创新并举、开拓务实的文化特质,对广东南拳的技术特征有各种或隐或显的影响,特有的地理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环境、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及体态特征是广东南拳形成的主要地域土壤因素<sup>[12]</sup>。新化是湖南有名的武术之乡,梅山武功是该县有名的一个地方拳种,在县域方圆数十里流传。梅山武功套路短小精悍,直来直去,动作紧凑,勇猛刚烈,手法多变,刚健有力,桩功稳固,不善用腿。这些风格形成与当地村落的民风也有很大关系,当地村民自宋代以来有勇猛强悍的性格,说话做事直来直往、干净利索、心胸开阔、敢做敢为,这一民风一直沿续至今<sup>[13]</sup>。而陕西红拳却有着“撑斩为母,化身为奇,勾挂为能,刁打为法”的风格特点,如果把岭南文化和梅山文化与关中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就会明白广东南拳和梅山武功与陕西红拳的技术风格特点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

### 2.3 文化相对主义与武术研究

文化相对主义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理解、文化态度和文化主张,越来越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关注。围绕文化与相对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事关国家、民族、社会的现实发展和未来走向,是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最初的文化相对主义,是对“欧洲文化中心论”在理论逻辑上的蒙昧观念进行的校正。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以所谓“历史的地理基础”为框架,

论述不同地域的文化“转化”为“更高的”他种文化的“进化”,以此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模式。他设定东方文化为最低级的历史,希腊、罗马文化是高一层级的历史,而日耳曼文化则是最高层次的历史,是历史的终点,普鲁士君主制则是“人类”最美好的政治制度。

20 世纪 20 年代,从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开始,到他的学生赫斯科维茨总其大成,逐渐发展出一套“文化相对论”思想:文化是特定社会中人们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的总和,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世代相传的价值观;由于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应该用它所属的价值体系来评价,不同文化的传统和价值体系是无法比较的;每一种文化都只能按其自身的标准和价值观念来进行判断;一切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对各该群体所起的作用都是相等的,因此文化谈不上进步或落后;一切文化都有它存在的理由而无从分别孰优孰劣,对异文化要充分尊重,不能以自己的文化标准来判断和评价。文化相对论的最核心之处是,社会纪律来自对不同特点的尊重,来自互相尊重。强调许多个而不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价值,是对每个文化的价值的肯定。应以寻求了解和协调为目的,而不是毁坏与我们不相吻合的东西。这种思想后来为绝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所接受。在当代,文化相对主义发展为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学说。这种学说从理论逻辑上来说,实际上就是博厄斯理论的现代版。但由于时代不同了,它的意义重点就在于对抗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sup>[14]</sup>。

在当今文化传播空前强烈,欧美工业和科技社会的强势文化携经济实力席卷全球,弱势文化遭遇空前生存危机的情形下,文化相对论对于保持和发展文化多样性无疑具有积极意义。2001 年 11 月 2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1 届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提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保护。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相对主义是发展中国家经常用以对抗发达国家文化侵略的有力武器。文化的存在及其传播、延续、发展的历史,肯定了相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否定了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今天的武术传承与发展,就应该坚持文化相对主义观点。武术应在弘扬民族文化的背景下,肩负起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捍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地位,对抗“文化帝国主义”,并在承传的过程中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的精神。

### 2.4 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与武术研究

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就是纵横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历时性研究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纵深研究,共时性研究就是对生活于不同地理环境下的民族及其文化作横向的跨文化研究<sup>[3]</sup>。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写照和印证。文化的多样性是依靠历史、通过历史并且同历史一起保存下来和发展起来的。无论就形式还是内容上看,文化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文化的发展性和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性和多样性的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时性与共时性也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因此,从纵向上看,文化的发展具有历时性。从横向上看,文化的发展具有共时性。

中国武术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全息缩影”,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中,也时时刻刻在经历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以游牧方式为主的蒙古族的入侵对于诞生于农耕文明的中华武术的发展无疑具有质的跃升;禅宗在少林寺的确立是印度僧人跋陀、菩提达摩为代表的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交融的结果,俞大猷将自己的棍法毫无保留的与少林僧人进行交流,同时位居中岳的嵩山四通八达,也为天下习武之人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这也是少林寺保持活力的原因之一;明代倭寇的入侵,使戚继光深刻认识到了日本刀法与中国刀法的优劣,而努力学习之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刀法内容;李小龙融中西武术为一体,开创了截拳道,成为中国武术影响世界的成功典范。事实上,中华武术能够保存下来离不开其“纵向”的继承和“横向”的吸收,在保持自己“文化根本”的同时,也善于融摄其他异质文化,只有这样才能为其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sup>[15]</sup>。但是,不可否认,中华武术从历史中一路走来,是受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华夏农耕文明的滋养而成长起来的,尽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但是,在它的演进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粘附了诸多糟粕,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用“文化自觉”的意识去“发现”,继承其中文化遗产,改革、摒弃那些落后、封建和神秘的东西,使武术在文化的自觉中走向繁荣。只有这样才能给予中国武术一个客观的评价,才是对武术和历史责任的表现,才能促进武术的发展。

因此,坚持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就可以在“动态”中全面把握武术发展的脉搏,处理好武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关系。

### 3 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武术研究

#### 3.1 文化变迁理论与武术研究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文化变迁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改变<sup>[16]</sup>。文化变迁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文化接触是引起文化变迁的最主要的原因(外部)。

在解释文化变迁的途径或过程时,人类学家经常运用传播(Diffusion)、文化丧失(Cultural loss)及涵化(Acculturation)等概念,这些概念与人类学对文化外部接触和冲击的关注有密切的关系。传播是文化形式的借用或流传过程中出现文化变动。传播是互动的、双向进行的,其范围及借用的程度决定于两个族群之间接触的持续时间与密切程度。文化丧失是一种文化形式取代另外一种文化形式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它对文化有很大的破坏性。涵化的过程受到很多人类学家的特别关注,它是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文化接触的含义相同,指由两个或多个文化体系接触、交流引起原有文化的变迁。涵化有很多可变因素,包括文化差别程度、接触的环境、强度、频率、友好程度、接触的代理人相对地位、流动的性质等<sup>[16]</sup>。

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和文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武术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文化变迁。因此,要用文化变迁理论去研究和认识武术,尤其是在武术国际化传播的过程中,处理好传播与涵化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文化丧失这一不良后果的发生。

#### 3.2 文化整合理论与武术研究

所谓的文化整合(Cultural Integration),意指文化的规范、制度、行为、习俗在一定的文化情境中的调适以及以某些决定性方式的综合,这种调适和综合既具有物化的统一性、系统性,又具有一般文化意义的逻辑的、情绪的、美感的协调性。简单的说,文化整合也即指一种文化变为整体或完全的功能和过程<sup>[17]</sup>。整合意味着文化不是各构成元素的单纯的机械的总和,而是作为有机体的相互关联的基本统一的整体。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认为,20世纪所缺乏的是能使所有各方面,包括经济、技术、生态、社会、物质、心灵和精神统一起来的一种“中心文化思想”,应从建立三种整合能力中突现“中心文化思想”。这三种整合能力是:第一,观察的新能力,即不再把观察者观察到的东西撕成碎片,不再用分割的、破碎的眼光看世界的能力;第二,静观的新能力,即不再用分割破碎的静态观看待新的生成与实现的能力;第三,创造一个整体实在的新能力,即不再把大脑、心灵和手的智慧撕成碎片。一句话,培育一种看

和创新的能力,即认识和看待生命的整合生成过程的新能力<sup>[18]</sup>。

种种迹象表明,当今的世界已联系成一个整体,这种情形预示着人类文化发展将面临着一次空前的文化整合。武术文化的整合过程必须处理好东西方文化的沟通、科学与人文的融汇、个体与人类的统一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等方面的关系。正因为文化整合包含着传承和创新两个方面,因此,武术的传承,绝不是对传统武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览无余的收纳和接受,而是对武术的历史传统、文化风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传承都要通过一种整合的机制来进行。而武术文化的整合,首先需要构建一道跟外面的世界保持双向沟通的文化桥梁,只有通过这个程序,中华武术才有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 3.3 文化安全理论与武术研究

文化安全问题并非始于今日,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性地展开之前,民族文化安全问题就已经存在。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是能够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文化<sup>[19]</sup>。人类的生产、生活、思维、习俗等既要受到自然的限制又要受到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但同时,人类又总是在超越限制中获得发展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20]</sup>处于不同的自然和历史条件下的拥有不同文化的民族都必然是在当下所遇到的不同的限制中进行生存与发展活动的。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所获得的有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方式也大都只具有当下的合理性。

文化安全的核心是要维护本国的文化利益,本质是要维护本国的文化主权,保持在文化上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文化的健康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就是要反对文化霸权,保障国家的文化主权,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文化是我们的强项,文化是我们的优势,文化是我们的形象,文化是我们的力量。”中国文化是全世界唯一的、绵延下来的、存活下来的活的历史悠久的文化<sup>[21]</sup>。武术是华夏文明长期滋养而发展起来的传统人体活动方式,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sup>[22]</sup>。把武术作为一个具体的传统文化事象放到文化安全视野中加以审视,不仅对武术在日趋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如何在“扬弃”基础上激发出的更新与历史绵延

的文化命脉保持一致具有理论价值,同时,也使有关武术的战略发展研究获得了全新的学术意义:从民俗文化的一个个案来讨论如何努力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在全球化中增强我们的文化创造力与竞争力,以此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尊严,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sup>[23]</sup>。

## 4 结 语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形态与文化个性。武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它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性,不仅展示着几千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风貌,而且在其形成完善过程中倾注着广泛的民族文化精髓。今天的武术,不论是从形式上,还是理论上,都深深地留下民族文化的烙印。当今的人类,已经进入到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一历史时期,我们应该充分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武术,把握时代的脉搏,让武术这一人类文化的璀璨明珠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芒。

### 参考文献:

- [1]郭玉成.传统武术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32(2):51-57.
- [2]童恩正.文化人类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3]罗康隆.文化人类学论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 [4]辞海(缩印本)[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1368.
- [5]胡文耕.整体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703-704.
- [6]杨建营.武术概念之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8,25(4):70-72,98.
- [7]蔺志华,虞定海.武术现代流变之探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8,42(6):69-71,79.
- [8]邱丕相,闫民,戴国斌.中国武术套路的文化解析[J].体育科学,2007,27(12):10-12,19.
- [9]王柏利,王岗.守卫中国武术发展的技术底线:打练统一[J].体育文化导刊,2008,(4):49-51,61.
- [10]且东.大危机[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126.
- [11]申国卿.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初探[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8,42(4):65-68.
- [12]李吉远,牛爱军.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探究广东南拳形成的地域文化[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8,42(6).
- [13]陈永辉,陈勤.对一个地域村落乡土武术的考察与分析[J].中国体育科技,2007,43(4):43-45.
- [14]李鹏程.文化相对主义的意义和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6):1-3.
- [15]王林,虞定海.全球化语境下武术发展的文化版图审视[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8,42(5):63-68,73.

(下转第 174 页)

情。

再次,通过优厚的政策来激励体育中介组织的发展。可以对其在土地征用、征税、购买电视转播权上予以政策上的优惠。在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体育组织必须开始逐步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减低对体育赞助市场的行政干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还要保证体育赞助市场发展的市场化,就必须借助于优惠的政策引导、扶持体育中介组织的正常运行,以减低市场中的交易摩擦,提高交易的成功率凭借优质、优厚的市场化服务来吸引企业赞助体育。

最后,要看到体育赞助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推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要从思想上转变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不仅要依靠国家来把握大方向,更多地要依靠通过体育市场融资来发展体育事业的新观念、新思路上。要提高政府体育组织对体育赞助的热情,加大对其的关注度。政府体育组织为中介组织、赞助商创设良好的体育赞助市场环境上下大功夫。

#### 4 结 语

现阶段我国政府体育组织对体育赞助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对体育赞助所产生的效益以及体育事业的推动尚未得到充分的认同。对体育赞助市场过多的行政干预,而在赞助市场方面又缺乏系统的、完备的立法来促进其社会化、市场化的进程,阻碍了

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要建立完善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赞助市场机制,政府体育组织必须强化体育赞助对推动体育事业的认知,减少行政干预,建立、健全完善的、系统的体育赞助市场法规,并通过优厚的政策来扶持、促进体育中介组织尽快成长以提高体育赞助市场整体的运行效率。当下政府体育组织及相关组织应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为根本目的,大力增强对体育赞助的本质和功能的正确认识,努力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体育赞助市场。

#### 参考文献:

- [1] 耿力中. 体育市场营销:决策与运作[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92-119.
- [2] 蔡俊五,赵长杰. 体育赞助:双赢之策[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347-374.
- [3] 鲍明晓. 体育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129-164.
- [4] 俞成士. 对体育赞助的定义和结构的理论研究[J]. 南京体育学院报,2002,16(3):7-9.
- [5] 吴兆祥. 发展我国体育赞助市场的策略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3,26(3):307-311.
- [6] 马志和,戴健. 论证府体育管理职能的转变与制度创新[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3,27(3):14-17.
- [7] 应菊英. 竞技体育与体育赞助的整合作用初步探讨[J]. 浙江体育科学,2002,(3):7-9.
- [8] 孙晓强. 体育赞助营销:整合的观点[J].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3,(3):60-63.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 [10] 王岗,田桂菊. 中国武术:20世纪的传统流失与当代的回归与振兴[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9):1156-1160.
- [11] 周伟良. 传统武术文化特征散论[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2,7(3):24-29.
- [12] 周伟良. 论当代中华武术的文化迷失与重构——以全球化趋势下的国家文化安全为视角[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19(1):4-17.
- [13] 黄淑娉,龚佩华.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 [14] 王世达,陶亚舒. 中国当代文化理论的多维构建[M]. 华龄出版社,2007:16.
- [15] Scharmer C O, Joseph J, Flowers B C. Presence: Human Purpose and the Field of the Future[M]. Society for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OL), 2004:231.
- [16] 马炜,张帆. 文化安全的文化人类学分析[J]. 云南社会科学,2006,(3):88-91.

(上接第 133 页)